

## 科幻小说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

张媛廖莉:对于您来说,科幻致命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程婧波:我觉得,科幻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思想实验,是感性极致和理性极致的融合。它既可以很感性,也可以很理性。所有文学作品的最终魅力都指向“虚构”,“虚构”承载着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而科幻文学就是一种能将“虚构”魅力放大到极致的类型文学。

张媛廖莉:在《橘子星球》等儿童绘本系列作品里,我们感受到您充满童心的幻想力、真挚的情感和责任感,儿童、真情、幻想、文学,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糅合四者并不容易。给孩子、成人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认为此类作品的内核是什么?

程婧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让我想起刘宇昆翻译《倒悬的天空》并在美国发表英文版的时候,有一次他转了外网上的一段英文读者评论给我看,读者的意思是,他知道我的儿童文学作家兼编辑的从业经历后,就理解了为什么我的小说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在一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了8年的儿童图书编辑,我自己也创作儿童文学。对于我来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每个作家永远逃不开“文如其人”的四字定律。

我觉得,玩游戏的过程就像是作者的创作过程。作者在写的时候,很难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很难去创造充斥着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新规则的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特质和元素的落脚点在于作者本人就是如此,我在写作的时候,只能天然地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去发掘那些题材、故事、情绪、情感。我的兴趣点在这里,我比较擅长的,乐于思考的方向也在这里,所以最后它们形成了我的作品。

张媛廖莉:您在自己的科幻创作中有着明确的“女性科幻作家”身份定位,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世界,让其他人明白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也是代表女性来表情达意的途径之一。您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也是中国第一本以作家性别为标准来收录的科幻作品集,结合您对国内外女性科幻作家创作的了解,可以谈谈对“女性科幻作家”身份的体察与理解吗?

程婧波:首先,我对女性的身份非常认可,对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也非常认可。有一天,凌晨姐跟我说想编一套女性科幻作家的书,我很愿意为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做点事情,之前我们没有以集体的形式浮出水面来出版这样的作品集,大家关注中国科幻和科幻创作,但缺乏以一个更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它们。

这套书收录的女性作家年龄跨度大,从80多岁的张静老师到“90后”的女性科幻作家,不过难免会有遗憾,没有把在中国进行创作的女性科幻作家全都收录进去。做这套书的时候,我们请33位女性科幻作家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很有意思,我甚至有一点震惊,因为不是每一位都认可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比如,钱莉芳老师不希望读者在读的时候去关注她的女性作家身份,而更希望读者关注的是作品本身。通过这样的工作机会,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每一位作家真实的内心,听到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这个工作非常有意。

这套书的后面附有我和赵海虹、姚海军的对话,我感到跟他们两位聊非常有趣,他们知道中国科幻的过往,尤其是在90年代和00年代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发展情况。在欧美,女性科幻作家经历过一段很严重的被打压时期,甚至有的女性科幻作家在发表处女作时,会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她们害怕被编辑或读者看出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由此,我认为无论怎么提女性作家的感知都不为过,当创作者用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代表女性来发声和表达,是值得被肯定的。

张媛廖莉:女性作家在科幻小说中表达自我、抒发情感,这一过程共同凝聚着力量。我们多数人认为科幻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正如您的《去他的时间尽头》等作品,既有科幻的未来感,又有奇幻对过去的多维书写。幻想文学不可能割裂“过

科幻小说往往涉及科技想象,科学家形象兼具科学话语层面和文本功能层面的多重作用,也因此成为科幻小说中最普遍的人物类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随着科幻文类在各种维度上不断深化拓展,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具有了丰富的书写向度,逐步呈现多元的面貌。本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形象一些代表性的书写特征进行归纳,兼及其形象塑造之得失的讨论。

## 作为“科学家”的个人

科学家是专职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实身份的定位决定了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与专业科技知识关系紧密,在作品当中承担起建构科技想象的功能。在这种基础上,对“科学家”这一职业身份的书写往往首先得到关注。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科学家形象一般被设定为大学、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的教授、研究员等专职人员,通过为科学家形象赋予特定学术资质、工作职责的方式确立其形象在科学领域的合法性来源。在很多具体文本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形象也普遍出现:从新时期之初科幻作家萧建宁《沙洛姆教授的迷误》中的沙洛姆教授,到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王晋康《亚当回归》中的钱人杰博士,再到近年来“更新代”作家双翅目(冯原)《基因源》中的Prof.Dan,对这些人物的科研能力的突出描写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科学家”的专业属性与学术水平,由此更加有利于展开小说的科学幻想内核。当然,一些科幻文本对科学家职业身份的书写也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刻板印象较为明显。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科幻当中十分突出,例如《波》中的王教授、《惩罚》中的乔博士等许多科学家在小说中基本只以“姓氏+职务”的方式出场活动,成为较为扁平的功能性人物。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和“更新代”的创作中,尽管此类情况有所淡化,但“戴眼镜”“穿白大褂”“不修边幅”等常见的科学家刻板印象仍然时有所见。在刘慈欣的《三体》中,物理学家丁仪博士直接被描写为“他真的很像爱因斯坦”,这种塑造方法固然能有效满足读者对大众认知当中“科学家”形象的期



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当“过去”和“现在”发生关联,我们便会拥有一种“怀旧”的心境,通过“怀旧”,我们好像被治愈了,重拾对“未来”的希望,那么,科幻等幻想文类也承载着一种“疗愈”或“抚慰”的文学功能吗?

程婧波:科幻的本质,其实仍在于“讲故事”。就像一封信,可以放在不同的场景中,不一定关于男女爱情。正如阿瑟·克拉克表达的可能是对宇宙的感情,他写的所有科幻小说如《2001太空漫游》,是写给人类,写给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封信。包括菲利普·迪克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去读他的作品,仍觉得很古怪、诡异,很赛博,其实它们同样是情书。

每一个科幻作家终其一生关注的题材、表达的东西、最后形成的虚构故事,都是在为某一个主题表达一种爱,这种爱其实很宽泛。作家的作品一定包含着他们的为人处事,包含着他们自身阅历的特征,写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情感。所以,从“治愈”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每一个作者:“如果你的这个作品是一封信,你觉得这封信的对象是谁?”可能会得到很有意思的不同回答。而对于我来说,我的情书真的跟“治愈”两个字有关。

我在《吹笛手莫列狐》里放了一段读者的话:“无嘴的莫列狐、吹笛手的故事。我无比喜欢。这个小说就像大胡子莫奈的那幅没有地平线的睡莲,一切都有关错误、沮丧和屡屡反复的光亮。”没有嘴的莫列狐是一个“树人”,这个读者说他很喜欢。我当时特别喜欢写很压抑的故事,但在这些压抑的故事里面,会有一束光亮存在。实际上,我要表达的不是那些压抑的部分,而是用压抑的部分去衬托出光亮。不管这个调色盘怎么调,无论那片光亮是微弱的还是明亮的,它就是我希望读者看到的地方,是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的、温暖的、光亮的、被治愈的地方。

## “我的情书是写给时间的”

张媛廖莉:时间循环的科幻叙事是西方科幻的主旋律,而中国也有循环历史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佛教的因果等文化质素的基础,在《赶在陨落之前》《去他的时间尽头》《宿主》等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中国家庭的成员关系、较为内敛的感情表达方式,因此有一种较浓厚的归属和亲切感,可以谈谈您在创作时间题材的作品时,怎样从“中国科幻作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时间中的人和事,并编织成故事的呢?

程婧波:在《去他的时间尽头》之后,我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当下的故事,关注我们中国人当下的情感生活。以前我从不太关注家庭生活,不关注中国人的伦理和情感,现在我认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很有意思。科幻小说是一个思想实验,把这些情感的、伦理的、家庭的大家熟悉的东西,

放到里面,推到极致。比如说在《去他的时间尽头》,我把一个社恐的空巢男青年放到科幻“时间循环”这一非常经典的题材里面,用这样的思想实验去观察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

在写《宿主》之前,我也没想过去关注中国人的婚姻情感生活。《宿主》讲的是女主角有一天突然发现她老公不见了,她老公的手机信号出现在青海,她就带着她弟弟、她弟弟的女朋友和老公的发小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宁,包了一辆车追着手机信号去寻找她的老公。这篇故事牵涉到中国人对婚姻的发问和反思:“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怎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渐渐疏离?”“她又是怎样接纳丈夫的离开?”把这些“日常”的问题放在科幻背景中,就能通过科幻的“反日常”展现出来。读者会感到其中的“反日常”很有意思,同时,情感内核指向中国人当下的情感状态。这也是我近几年比较感兴趣的东西,这跟我的阅读趣味、创作趣味以及自己生活重心的转变有关联,可能也是我接下来几年的创作方向之一。

此外,时间是我作品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倒悬的天空》扉页写着:“谨以本书献给所有时间中的旅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中的旅人,书的最后一页是阿瑟·克拉克的话:“我们都是宇宙的过客。”我很赞同这句话,这也牵涉到我刚开始说的问题,每个科幻作家的表达都是一封信,可以说,我的情书是写给“时间”的。时间让我们拥有很多东西,又让我们明白所拥有的其实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让我们生发出很多哲学思考,生发出不同个体的三观。一个人怎样去看待“时间”,就是他怎样看待自身在宇宙、社会、人生当中的位置。

张媛廖莉:《宿主》《去他的时间尽头》等作品中,有着蒙太奇的多组镜头和剧本式的场景、对话形式,它们形成一个具体场景下的片段叙事,各个故事镜头里的人物和情节彼此呼应、暗示,因而呈现出“非线性”和“碎片化”的时间观,您怎样理解叙事方式对时间观的建构作用呢?

程婧波:之前有人谈到《西天》也是在讲时间,我是在2002年写的《西天》,《去他的时间尽头》写于2018年,中间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但我同样痴迷于时间。《西天》与时间的关系很密切,它牵涉到比科幻上的时间循环更复杂的轨迹。通过时间再关联到作品中体现出的“非线性”等叙事策略,这个关联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曾有心理学家在分析人的思维时认为,有些人是“听力型”的,有的人是“画面型”的,你需要了解自己是“听”还是以“看”方式去思考的人,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在创作时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实际上,我会先去看到这个故事。这很像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中的“七肢桶”外星人,他们的时间观非常奇特,可以同时看到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的文字

的行动为科学事业而牺牲,诠释了高尚的科学品德。整体而言,这些书写一方面塑造出丰富可感的科学家形象,另一方面亦侧面呈现当代社会对科学家、科学精神的公众认同。

## 作为“个人”的科学家

“文学是人学”,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个人”面貌亦需加以关注。除却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初一部分科普型科幻当中作为功能性人物的科学家之外,在当代中国科幻的整体发展趋向当中,科学家形象的“人情味”是在不断丰富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金涛在《月光岛》中细腻描绘了孟教授夫妻对女儿孟薇的挚爱亲情、主人公梅生与孟薇的纯洁爱情,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亦刻画出青年科学家陈天虹与导师赵谦教授之间深切的师生情谊。90年代挣脱“科文之争”以来,诸如刘兴诗《雾中山传奇》中的主人公“我”出于友情踏上了寻找失踪的考古学家曹仲安的道路,柳文扬《圣诞礼物》中的物理学家信文、凯德为了弥补亲情和爱情的遗憾而穿梭时空,还有“新生代”“更新代”笔下许多对科学家家庭情感、人际关系的书写,都是当代中国科幻塑造科学家个人生活、社会身份诸多面相的丰富探索,使得许多科学家形象具有饱满立体的人物特质。

在对科学家形象“个人”身份的勾勒之上,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对科学家复杂人性的刻画与想象也由此得以展开,具体呈现为不同的科学家形象类型。新时期之初吴岩《引力的深渊》中主张消灭人类以保护自然生态的科学家伊立鑫,20世纪90年代王晋康《科学狂人之死》中尝试克隆自己的生物学家胡狼,新世纪以后张冉《大饥之年》中传播食人瘟疫的病毒学家安德鲁·拉尔森等许多科学家形象的塑造都颇有深度,作为科幻文学最经典的人物类型之一,这类“疯狂科学家”形象的书写从不同的科技伦理视角提供对人性迷失、人性堕落问题的批判向度,并揭示“科技作恶”的可能,有很强的启发性。与之相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腐蚀》中为了制成抗腐蚀剂先后牺牲的三位研究人员,90年代王晋康《生死平衡》中通过独特疗法在第三世界救死扶伤的皇甫林,新世纪刘慈欣《混沌蝴蝶》中运用混沌学原理制造气象异常以

与思维是契合的。我和“七肢桶”可以成为一种镜像,他们有了特殊的文字,因而才有特殊的时间观,而我可以先看到一个故事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果,以及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先把这个故事看完整,再把它转译成汉字,转译成文学的语言,最终写出来。当然,在转译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文字是线性的,但是我的思考方式是非线性的,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会有一些处理方法,这些方法会帮助我尽量克服文字线性之局限,使之有非线性的表达存在,更接近思考过程本身。

## 科幻是“非人”给“我们”说的情话

张媛廖莉:《吹笛手莫列狐》和《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中探讨着“自由”问题的不同面向,树人莫列狐“虽然失去了自由,却拥有了一颗真正的心”,爱、身心、自由相互统一;在风之皮尔城岛屿上的人们,以为自给自足的生活带来的是自由的文明,其实却是“文明人”植入“结石”货币的傀儡,在两篇故事中,您是如何理解万物的自由之可能性呢?

程婧波:把这个归纳成“自由”是一个很好把握的点。当时写这两部作品时,我自己也处在人生的叛逆期,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叛逆期“中二”少男少女的状态。你们可以看到,在《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里,男女主人公是“中二”的少男少女,他们被污蔑成杀人犯,其实这个故事是对叛逆期少年的一种极端呈现,通过“他们被污蔑成杀人犯”这一境况来体现这种叛逆。这种叛逆在奇幻小说中可能会更加轻易地实现。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好人都被诬陷,随之发生了命案,角色都是叛逆期的少男少女,这可能与我彼时整个人的状态有关。

这几年,我开始写一位女性如何看待婚姻了,这好比比我是一头小鲸的时候,我在海里感兴趣的是小礁石,而当她越来越大,成为一头庞然大物,别人无法伤害她的时候,我可能想去吃大章鱼,口味的变化与个体的成长有很大关系。这两篇作品的关联性很强,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我个人也关注叛逆期时人的心态,所以作品也在反映这样的心态,主人公对自由的追寻反映的也是现实“中二”少年关心的那些问题。作品主题与创作者的创作关注点相联系,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作家在某个阶段可能去关注叛逆的主题,这突出表现在故事中的角色是怎样理解自由的。叛逆是哪里就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反抗就是对自由的追寻。

张媛廖莉:您的故事里写道:“羊羔、抹香鲸和孩子是同一种东西。就好比小偷、盲鳗和开膛手,是同一种东西。”当人类的“孩子”处于这些相互交织的明喻中,我们发现了“人”在自然、社会、文明中的荒谬处境,这三组关系直击人心,又让人感到几分惊悚,可以谈谈您对人类文明的个体体察吗?其中人与非人形象的并置是否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呢?

程婧波:我非常关注“非人”,之前没有在自己作品集后记或其他访谈中专门讨论“非人”问题,但这是一个不断反问自己的问题,我在问自己是不是特别关注这类题材,是否喜欢在作品中去展现人与“非人”的关系,也在问自己为何这么着迷“非人”。当时写完《像苹果一样地思考》后,我写了《你看见它了吗?》,它和前者一样,都非常古怪,里面的人被外星生物寄生大脑,他们以第一人称不停地讲一些很古怪的话。我可能在探索人与“非人”的一种分界点,一个“人”被外星生物寄生了,并用第一人称说话,这之后,我越发对“非人”感兴趣。

在《吹笛手莫列狐》中,我虚构了人类社会和“树人”社会,把人类社会与“非人”社会作了对照,《赶在陨落之前》也是这样。科幻为我找到了一种可以非常自如地展现人与“非人”对话性的文学表达方式,所以才可以自由地去创作这样的作品。而《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则是对人类社会的洞察,也是尝试用经济学进行的一次思想实验。我记得当时“星云奖”的颁奖词说非常精准,说这部小说讲的是经济学的原理,把经济学的东西放在一个封闭的岛屿,去进行思想实验,展现一个故事。颁奖词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也许我们常常看到的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数学进行思想实验而写就的科幻小说,但经济学相当于将社会学也纳入了科幻小说写作实践中,在一个更加原始、另行的逻辑上,人与社会对抗的主题在此会显得更加直接一些。

阻止战争的气象学家亚历山大等许多“英雄科学家”形象的独特塑造,这类人物的书写则集中反映人性的正义与良知一面,折射着“科技为善”的理想主义光辉。在上述两种典型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家形象中存在诸如“犯错的科学家”“骗子科学家”等许多科学家形象类型,这些创作实践都为科学家形象注入了人文关怀的创作内核,也由此推动当代中国科幻走向更具有文学性和艺术价值的前景。

## “中国科学家”的形象建构

诚如学界诸多已有论述所言,对于作为一种独特文类的中国科幻来说,“何谓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一个关键。类似的,当代中国科幻中科学家形象的形象的“中国性”也是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科幻作家的创作中,值得注意的是童恩正、刘兴诗等人笔下的考古学家形象,以《在时间的幕布后面》中的欧阳去非为例,这类科学家形象延续了十七年时期科幻《古峡迷雾》等作品中的书写范式,多有强烈的民族立场,令科学家的形象走向在地化,对“中国科学家”形象的建构有着先驱意义。中国科幻进入90年代,许多作品对科学家主人公的书写着重凸显“中国人”的属性,典例有绿杨《太空神探重凸显》系列中的天文学家鲁文基教授,他被塑造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典型中国式长者,“姜还是老的辣”等中国谚语也不时出现在其口中。在后冷战语境中,民族身份的认同不断得到强化,中国科幻中的科学家形象也就呈现出鲁文基这样自觉的文化意识,由此科学家“中国性”的面貌逐渐清晰。随着新世纪的进程,“中国科学家”的形象在“新生代”“更新代”的科幻作家笔下日益丰富,有何夕《田园》中海外学成归来的“脑域”专家陈橙,也有长庚《昆仑》中在架空的上古西周时代寻找“昆仑”真相的堪舆师、偃师。在全球化浪潮的复杂动向当中,新世纪的中国科幻一面向外书写世界中的“中国科学家”形象,以鲜明的“中国”属性融入开放的世界图景;一面向内挖掘“中国科学家”形象更多的自身可能,谋求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资源的深度开拓。在“丝绸朋克”等中国特色的科幻题材不断涌现并走向繁荣的当下,“中国科学家”形象今后的建构和发展也尤其值得进一步期待。



待视野,却也有将科学家形象抽象化和符号化处理的倾向。

为了贴近对科技想象的具体描述,科学家形象大多还需要具备明确的学科背景和专业领域,具体到不同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学科归属存在不同的书写趋势。在新时期初期的作品当中,以叶永烈《怪事连篇》中发明人体冷冻“冷葬”技术的陈克教授、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研发原子电池的赵谦教授等人物形象为代表,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基本占据这一时期科学家形象的主流,较多地体现科技的社会功用价值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的作用,以此呼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现实需求。进入90年代,诸如王海兵《谁胜谁负》中的凯恩教授、潘海天《克隆帝国》中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奥古斯等从事“脑机接口”“克隆人”等未来前沿科技研究的科学家形象纷纷登场,还有许多如王晋康《西天噩梦》中的伊来·阿丹教授等形象归属于“时间机器”等虚构的学科领域。90年代以来,挣脱“科文之争”和科普要求的中国科幻不再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科学家形象一方面反映其广受关注的许多新兴科技话题及其领域,另一方面以大胆的幻想呈现未来科技成果的诸多可能性。延续这股潮流,新世纪的“更新代”科幻作家继承了“新生代”对新兴科技的高